

学 習 文 选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



湖北人民出版社

学 习 文 选

(十)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

湖北人民出版社編輯、出版（武漢解放大道332号）

武漢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新出字第1号

湖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武汉市国营武汉印刷厂印刷

850×1168 1/32 • 5 1/8 印張 • 123,000字

1959年10月第 1 版

1959年11月第 3 次印刷

印数：80,001-110,000

統一书号：3106 • 217

定 价：(5) 0.40 元

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勝利

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十周年，
為“和平和社會主義問題”雜誌而作

（一九五九年九月十四日）

劉少奇

偉大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從成立到現在，已經有十周年了。

中國革命是偉大的十月革命的繼續。偉大的十月革命開辟了人類歷史的新紀元，開始改變了世界的面貌。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成功，以蘇聯為主力軍的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歐亞許多社會主義國家的建立，都表明社會主義的興起和資本主義的沒落是不可抵抗的歷史規律。中國革命的勝利，進一步改變了世界的面貌。中國革命把帝國主義在東方的戰綫打開了一個很大的缺口，使帝國主義的殖民主義制度遭到致命的打擊。新中國參加了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蘇聯、中國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一起，結成了占世界人口三分之一、在歐亞兩洲連成一片、團結友好的社會主義大家庭。對於一切曾經遭受過或者正在遭受着帝國主義壓迫的落後國家的人民，中國革命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他們感覺到，中國人能夠做到的，他們也應當能夠做到。所有這些，清楚地說明，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在全世界的力量對比，已經有了新的變化。

中國革命的勝利，使得中國社會生產力獲得徹底的解放，使

得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設能够一日千里地、突飞猛进地向前发展，从而迅速地改变着中国貧穷和落后的面貌。

中国在全国解放后的最初三年間，从一九五〇年到一九五二年，順利地完成了恢复国民經济的任务，使工农业生产一般地达到了和超过了旧中国的最高水平。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五七年，中国人民执行了第一个五年計劃，使工业总产值增长了百分之一百四十一，农业总产值增长了百分之二十五，使现代工业在国民經济中的比重，从一九五二年的百分之二十六点七提高到一九五七年的百分之四十。第一个五年計劃的完成，为中国建立了工业化的初步基础。从一九五八年起，我們开始执行第二个五年計劃。一九五八年出現了国民經济的大跃进。工业总产值比一九五七年增长百分之六十六，农业总产值比一九五七年增长百分之二十五。今年又在去年大跃进的基础上繼續跃进。同一九五八年相比較，今年工农业总产值，計劃增长百分之二十，工业总产值計劃增长百分之二十五点六，农业总产值計劃增长百分之十。鋼、煤、冶金設備、发电設備、金屬切削机床、棉紗、原木、粮食、棉花等項工农业主要产品的計劃产量，都将完成、超过或者接近第二个五年計劃原定在一九六二年完成的指标。中国社会生产力这样飞速的发展，是任何資本主义国家所不能比拟的，当然更不是旧中国的条件下所能梦想的。

馬克思說得完全正确：“革命是历史的火車头。”在中国，沒有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資本主义的民主革命，沒有廢除資本主义制度的社会主义革命，就不会有現代工业、現代农业和現代科学文化的迅速发展，就不会有象今天这样全国人民精神焕发、意气昂揚地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的局面。革命給中国人民带来了无穷的希望和异常光辉灿烂的前途。

中国人民十年来的胜利，是馬克思列宁主义的胜利，是中国

共产党领导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的民主革命的总路线、社会主义革命的总路线、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的胜利。

在中国的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反复地阐明了这样的思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整个中国革命运动，是包括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在内的全部革命运动；……只有认清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同时又认清二者的联系，才能正确地领导中国革命。”^①一方面，中国革命中的右倾机会主义者正象俄国的孟什维克一样，他们用一道“万里长城”把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隔开，看不到这两个革命之间的相互联系，在民主革命中看不到有把这个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的前途。另一方面，“左”倾机会主义者又类似俄国的托洛茨基主义者，他们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要在民主革命阶段内消灭资产阶级，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这两种错误倾向，都曾导致中国革命受到很大的损失。同“左”右两种机会主义相反，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指导中国革命的正确方针是：一方面，实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发展阶段论，把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这两个阶段的革命任务明确地区别开来；另一方面，又实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不断革命论，把这两个革命密切地联系起来，在民主革命阶段就尽一切可能为将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准备条件，以便在民主革命取得全国胜利以后，不停顿地立即展开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

无产阶级经过共产党紧紧地掌握民主革命的领导权，是保证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和由民主革命胜利地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关键。任何中国的资产阶级政党，都提不出彻底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纲领，都不可能把中国的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在无产阶级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1952年人民出版社第2版，第646页。

階級領導下，以工农聯盟為基礎，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徹底地進行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鬥爭，這就是我們黨領導民主革命的總路線。這條總路線，按照毛澤東同志的概括，叫做“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革命”^①。

中國是一個落後的大國，它的農村人口占百分之八十以上，貧農和雇農又占農村人口的百分之七十，農民問題是我國民主革命的中心問題。舊中國的反動統治是極端野蠻的，人民群眾處於完全無權的狀態，進步的革命家大批地受到逮捕和殺戮。因此，在民主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就深入農村，領導了農村包圍城市的武裝革命鬥爭，達二十二年之久。黨採取了堅決依靠農民的政治覺悟和組織力量、發動農民自己救自己、自己打倒地主、取得土地、保衛土地的群眾路線的方針（黨的這個方針一直繼續貫徹執行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的土地改革中），而不是採取與此相反的把土地“恩賜”給農民的資產階級的方針，就使黨在农村中建立了強大的可靠的革命堡壘，建立了革命軍隊和革命根據地，把廣大貧苦農民的革命積極性和革命紀律性逐步提高到接近於革命無產階級的水平，並且從他們中間取得了黨和黨所領導的人民軍隊所需要的源源不斷的人力、物力後備。中國共產黨依靠農村革命根據地進行的革命戰爭，在农村革命根據地進行的土地改革和經濟文化建設，實際上是為準備全國勝利而進行的長期反復的偉大的演習。在這些演習中，教育了群眾，鍛煉了軍隊，積蓄了革命力量，培養了幹部，並且使黨的領導在各方面都取得了豐富經驗。

因為在民主革命中建立了無產階級和廣大農民群眾的最密切

① “在晉綏幹部會議上的講話”。

的聯盟，我們就能夠正確地解決同民族資產階級建立革命統一戰綫的問題。根據中國的具體情況，我們正確地區別了中國資產階級的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官僚買辦資產階級，他們是帝國主義的工具，是封建主義的保護者和同盟者，是民族民主革命的凶惡的敵人，必須對他們進行堅決的鬥爭。另一部分是民族資產階級，他們遭受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壓迫和排擠，要求獨立發展民族經濟，因此，他們有參加革命或者對革命保持中立的可能。但是，他們有軟弱性，有革命和反動的两面性，經常處於動搖的中間地位。這就要求我們，一方面，要在一定的條件下聯合他們進行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資本的革命；另一方面，又要同他們的妥協性進行鬥爭。實行了這樣的統一戰綫政策，我們就達到了壯大革命勢力、爭取中間勢力、孤立反動勢力的目的，鞏固地保持了無產階級的革命領導權，團結了最廣大的人民群眾。

在中國民主革命時期，割斷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這兩個革命的聯系的右傾機會主義者和混淆這兩個革命的“左”傾機會主義者，都不懂得農民問題對我們的革命事業有多么重大的意義，因而也不能正確地處理資產階級的問題。右傾機會主義者對資產階級採取投降主義的路綫，把民主革命看成主要是資產階級的事情。他們不去依靠工人和農民的聯盟，而主要地依靠同資產階級的統一戰綫；並且對於資產階級只進行聯合，而不進行必要的鬥爭。這樣，他們就放棄了無產階級領導權，在資產階級叛變革命的情況下，就使革命遭到失敗，使無產階級和廣大人民的事業遭到嚴重的挫折。就是在革命勝利的條件已經成熟，需要抓住時機，進行決定勝負的鬥爭的時刻，這些右傾機會主義者也不敢爭取勝利，甚至要阻止勝利。“左”傾機會主義者不願意聯合各種小資產階級群眾和民族資產階級，並且錯誤地把中間力量作為主要的打擊方向，否認在民主革命中有聯合或者中立各種中間力量的必要

和可能。他們对民族資產階級只进行斗争，不进行适当的联合，更不愿意利用敌人的具体矛盾，集中力量去反对最主要的敌人。結果也放弃了无产階級領導权，使无产階級陷于孤軍作战，使革命不可能得到胜利。“左”傾机会主义者和右傾机会主义者有一个共同点，他們都忽視农民的革命要求和革命毅力，在反动統治时期，不承認我們能够在农村站得住脚，能够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能够經過农村包圍城市并在最后达到夺取城市的目的。所以，“左”傾机会主义者和右傾机会主义者，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互相調換位置。例如王明同志，他是我国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第三次“左”傾路綫的主要代表人，但到了抗日战争时期，又成为右傾机会主义的主要代表人。

以毛澤东同志为首的中国馬克思列宁主义者，在同“左”、右两种机会主义的斗争中团結了全党，从而使中国革命沿着正确的道路向前发展，使一个革命胜利接着一个革命胜利。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的胜利，彻底地粉碎了旧中国国民党的反动統治，粉碎了它的压迫人民的官僚机构和軍閥机构，从而在一九四九年建立了實質上是无产階級专政的偉大的人民共和国，这就順利地实现了从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轉变。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在革命的最主要問題即政权問題上，标志着中国民主革命的終結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中国无产階級在領導民主革命取得胜利的同时，巩固地建立了自己对国家的政治統治权，因而就不需要为社会主义的胜利再进行一次夺取政权的斗争。这是由于我們党在民主革命中一分鐘也沒有忘記我們的最后目的是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因而在民主革命的长期斗争中就十分注意地确立了并且巩固了无产階級領導权的結果。

在一九四九年三月，全国胜利前夕，毛澤东同志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就指出，在中国革命取得全国胜利以后，国外的主要

矛盾仍然是中国人民和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而国内的主要矛盾則将由中国人民同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讓位給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并且提出了解决这个矛盾的一系列的基本政策。中国人民在全国胜利后的最初几年，虽然还必须繼續解决民主革命阶段遺留下来的任务，主要是在全国很大地区进行土地改革来消灭封建地主阶级的任务，但是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实际上已經在一九四九年开始了。中国无产阶级依靠广大群众的支持，通过国家的力量，沒收官僚資本，牢牢地掌握了国家的經濟命脉，积极地建立了强大的社会主义的国营經濟，并且使这种經濟在整个国民經济中居于领导地位。

在一九五二年年底，当恢复国民經济和肃清封建殘余的任务基本完成的时候，以毛澤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綫，即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同时并举的总路綫，規定了在全国范圍內逐步实现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任务。在提出这条总路綫的时候，我国人民正在进行着偉大的抗美援朝战争。我們一方面同企图扼杀新中国的美帝国主义进行坚决的斗争，在这个斗争中团結了全国人民，取得了偉大的胜利；另一方面，在国内，一步不停地繼續进行着社会改造和建設的工作。

中国共产党的这条总路綫，是引导中国社会由当时的既有社会主义經濟、又有资本主义經濟、又有个体經濟的复杂的經濟結構，过渡到单一的社会主义的經濟結構的路綫。当时，有些人否認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必要性。他們或者企图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走资本主义的老路；或者企图把革命停止下来，长期保持既有社会主义經濟、又有资本主义經濟的現狀。党的这条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总路綫肯定要由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从而否定了从右

的方面来的各种錯誤观点。同时，党的这条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总路綫又肯定了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必須是逐步的，对資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必須是逐步的，从而否定了企图在一个早上就把資本主义消灭得干干淨淨的“左”的錯誤观点。

我們在农业和資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作中，根据我国的具体条件，采取了一系列具有民族特点的步骤。

我們在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方面采取三个互相衔接的步骤。第一步，在土地改革以后，紧接着广泛地发展了在个体經濟基础上的集体劳动的互助組織。这种互助組織带有社会主义萌芽性質，在革命根据地时期就已經出現了。第二步，在这种互助运动的基础上，紧接着又发展了以土地入股、統一經營为特点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土地和主要的生产資料还是私有的，这种合作社具有半社会主义性質，我們把它叫做初級农业生产合作社。第三步，就是实行土地和主要生产資料的集体化，建立完全社会主义性質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这就是我們所說的高級农业生产合作社。

在农业合作化問題上，我們党内曾經有过不同观点的爭論。

有一种观点，認為我們工业化水平还很低，还不能实现农业机械化，因此，要很快实现农业合作化是不可能的，也是不應該的。这种观点已經被事实駁倒了。我們在基本上沒有机械化的条件下，完成了农业合作化的任务。

有一种观点，認為迅速实现合作化，势必降低农业生产。这种观点也被事实駁倒了。在农业合作化的过程中和合作化以后，我国的农业生产不但沒有降低，反而不断上升，并且上升得相当快地。

还有一种观点，認為我們这样迅速地实现农业合作化，会妨碍农民的团結，就是說，除了富农以外，富裕中农也会不滿甚至反对我們，而支持我們的将只有比較貧苦的农民。这种观点也被

事实駁倒了。由于我們对富裕中农采取团结的政策，对富裕中农入社的大农具和牲畜采取逐年偿还代价的政策，由于合作社生产的逐年上升，絕大多数富裕中农对合作化是基本上滿意的。

总之，事实証明，我們紧接着土地改革之后“趁热打铁”，不停頓地采取典型示范、逐步推广的方法进行农业合作化，是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好政策。如果我們在土地改革以后把革命停頓下来，讓农村資本主义的自发势力发展起来，听任农民向两极分化，那在以后要实行合作化，就会遇到很大的阻力，就会困难得多。

我們对資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又是怎样实现的呢？主要是对資本主义工商业采取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通过国家資本主义的各种形式而达到社会主义国有化的目的。一般說来，国家資本主义的初級形式，是对私人資本主义工业实行供給原料、加工訂貨和統購包銷，对私人資本主义商业采取讓它們經銷代銷的办法；国家資本主义的高級形式，是对私人資本主义企业实行公私合营，由个别企业的公私合营到全行业的公私合营，在一定年限內給資本家一定的年息。

在資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問題上，我們党内也发生过一些不同观点的爭論。

有一种观点，認為对資本主义工商业只应当加以利用，而不应当加以限制和改造，或者說我們限制得过多、改造得太急了。这实际上是企图讓資本主义制度长期保持下去。資本主义的剝削制度和社会主义公有制度在同一个社会中，不是这个战胜那个，就是那个战胜这个，长期并存是不可能的。

有一种观点，認為我們对資本主义工商业又是逐步改造，又是实行贖买，又給資产階級选举权，又給資产階級的代表人物以一定的政治地位，“太妥协了”。他們認為，在中国革命胜利以后，

我們还同民族资产階級保持統一戰綫，是原則上不許可的。他們要求用对待地主階級和官僚资产階級那样的政策去对待民族资产階級，即沒收民族资产階級的財產，或者从国民經济中对資本主义工商业采取簡單的、迅速挤垮的政策，并且剝夺資本家的选举权。这些人忘記了，在一定的具体历史条件下，无产階級对资产階級采取贖买政策，是对无产階級有利的，这是馬克思和列宁多次說过的。至于无产階級专政并不一定要剝夺资产階級的选举权的問題，列宁在“无产階級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一書中也講过：“限制选举权的問題是某一国家中实行专政的特殊問題，而不是专政的一般問題。”①

我們对于无产階級和资产階級之間的矛盾，是不是采取了“階級調和”的政策呢？当然不是。这种怀疑是完全不懂得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种誤解或曲解。实际上，我們为解决这个矛盾而采取的对民族资产階級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是无产階級的极其坚定的階級政策，同“階級調和”政策沒有絲毫相同之处。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成功完全証明了这一点。

总之，我們对資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政策，減少了社会主义改造的阻力，并且在逐步改造的过程中有条件地利用了資本主义为社会主义服务，以利于社会主义建設的进行，而結果是我們能够在生产資料所有制方面彻底地消灭資本主义，并且要把资产階級分子逐步改造成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这当然也是完全适合中国条件的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好政策。

我們对农业和資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采取这种逐步过渡的办法，并不象有些人所說的，拖长了改造的时间。相反，改造进行得很快。到一九五五年下半年，我們已經实现了农业的

① “列宁全集”第28卷，第237頁。

高級合作化，而緊跟着在一九五六年，就實現了資本主義工商業的全行業公私合營，與此同時，也實現了手工業的合作化。這就是說，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不到七年的時間內，我們已經基本上完成了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的任務，基本上解決了生產資料所有制方面“誰戰勝誰”的問題。我們在解決這個任務的過程中，幾乎完全沒有引起什麼破壞，工農業生產一直是上升的。

在生產資料所有制方面的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以後，我國的社會主義革命是不是結束了呢？有人認為是結束了，再不需要進行任何革命了。我們認為這種觀點是不正確的，社會主義革命還沒有結束，還必須繼續進行革命，把社會主義革命進行到底。在現在，我國的資本家還拿定息，在經濟上作為兩個階級的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還沒有完全消失。即使資產階級在經濟上作為一個階級完全消滅以後，資產階級的世界觀，資產階級的政治影響，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习惯勢力，還會存在一個很長的時期，而同社會主義制度相抵觸。特別是資產階級右派，還會利用這些情況，伺機向社會主義舉行進攻，陰謀復辟資本主義，有時他們的進攻還會達到非常猖狂的程度。因此，社會主義革命決不能局限於經濟戰線上，還必須在政治戰線上和思想戰線上進行社會主義革命。毛澤東同志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這個著作中明確地提出了這個問題。他說：“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鬥爭，各派政治力量之間的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在意識形態方面的階級鬥爭，還是長時期的，曲折的，有時甚至是很激烈的。無產階級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觀改造世界，資產階級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觀改造世界。在這一方面，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誰勝誰負的問題還沒有真正解決。無論在全人口中間，或者在知識分子中間，馬克思主義者仍然是少數。因此，

馬克思主义仍然必須在斗争中发展。”^①

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在整个过渡时期都是不可避免的。不过这种斗争象波浪的起伏一样，有时候高，有时候低，有时候表现尖锐，有时候比较缓和。这种斗争，要到资产阶级的政治的和思想的影响最后消灭的时候，才会熄灭。

为了要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毛澤东同志提出了要区别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要采取不同的方法去对待和处理这两类矛盾，并且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一九五七年，我们党发动了调整人民内部关系的全党全民的整风运动，进行了反对资产阶级右派猖狂进攻的斗争。结果是大大地鼓舞了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大大地打击和削弱了剥削阶级在政治领域和思想领域中的反动影响。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党提出了“政治挂帅”的方针，加强了党对经济工作及其他各种工作的领导，调整了中央与地方、领导与被领导以及其他方面的相互关系。同时，党又向全国人民提出了“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发扬敢想敢说敢做的共产主义风格”的口号，鼓励革命性的试验和群众性的发明创造，领导群众修改或者废除那些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为了进行教育革命，党又提出了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由于采取了这一切革命的措施，毛澤东同志所说的那种“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在我国日益广泛地发展起来。在一九五八年春天，我们党及时地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

在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鼓舞下，全国人民斗志昂扬，

^① 毛澤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人民出版社版，第26—27頁。

意气风发，就在一九五八年实现了国民经济的大跃进，在全国农村中实现了人民公社化。科学技术和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也获得了空前未有的大成绩。这是彻底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从而彻底解放了社会生产力所得到的结果。

在区别两类矛盾、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这些问题上，在我们党内也有过不同观点的争论。我们党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坚持了正确的路线，批驳了党内各种错误的观点，因而就能够团结全党和全国人民，在社会主义事业中不断地取得新的胜利。

有人说，在过渡时期存在着敌我矛盾，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存在着人民内部矛盾，是不可理解的。他们认为不要划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样两类矛盾。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划清这两类矛盾，对于如何正确地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如何正确地处理劳动人民内部不属于阶级斗争范畴的各种矛盾，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的意义。

在现在的中国，不只是存在着敌我矛盾，还存在着大量的劳动人民内部的矛盾，例如：由于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之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还存在着差别而产生的矛盾，由于劳动人民中间遗留着剥削阶级的习惯上和思想上的影响而产生的矛盾，等等。至于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以及人们由于认识上的正确和错误、先进和落后的差别而产生的矛盾，则是从来就存在，现在也存在，并且在以后还要永远存在下去的，只是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这些矛盾的性质和解决方法已经和阶级社会中根本不同了。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或者在阶级完全消灭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以后，人民内部就不再存在矛盾的观点，是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完全错误的观点。

社会上所存在的各种矛盾，都必然地要在我们国家的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中表现出来，也必然地要在我们党的生活中反映

出来。因此，我們必須学会正确地認識并且正确地处理这些矛盾，才能彻底消灭反社会主义的敌对势力，完成对資產階級和上层小資產階級分子及其知識分子的改造，并且調整人民内部的关系，把我們的事業順利地推向前进。在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中，矛盾的統一和斗争，矛盾的解决，仍然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动力。

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如果不注意划清这两类性質不同的矛盾，就会产生几种錯誤傾向：看不見敌我矛盾，或者把敌我矛盾看成人民内部矛盾，不知道对待敌我矛盾必須采取专政的方法，即孤立、分化、懲办和鎮压的方法，而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去处理敌我矛盾，这就必然要犯錯誤。反之，看不見人民内部矛盾，夸大敌我矛盾，把人民内部矛盾看成敌我矛盾，不知道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必須采取民主的方法，即“从团結的愿望出发，經過批評或者斗争使矛盾得到解决，从而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結”的方法，而用处理敌我矛盾的方法去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就是說，不用說服的方法，而用压服的方法，这也必然要犯錯誤。此外，这两类矛盾在一定的条件下，是可以互相轉化的，如果矛盾轉化了，而我們的处理方法不隨之而轉化，也必然要犯錯誤。我們的同志在这个問題上犯錯誤的具体事例是不少的，因此，認真地認識這個問題是十分必要的。

有人說，我們采取“百花齐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就是采取資產階級“自由主义”的政策，即所謂“自由化”的政策。也有一些人担心，我們实行这样的方針，会助长反社会主义的毒草，造成資產階級思想的泛濫。所有这些人都想錯了。

我們实行这个方針，是因为我們对党的領導，对人民群众的大多数，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对馬克思主义的真理，具有充分的信心。我們采取这个方針，絕不是实行資產階級的“自由